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INSTITUTE OF AREA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9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  
学术简报



“博雅工作坊”第八工作间

## 巴基斯坦——犍陀罗佛教文化与中国新疆的佛寺

2018年6月28日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是北京大学开展国别与区域研究的综合性学术平台，是一个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智库功能三项工作为一体的建制单位。它以各院系现有相关学科的研究基础为依托，充分尊重和利用历史资源和现有条件，动员北京大学多样化的学科力量和长期积累的国内外联系，整合和盘活各院系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梯队与物质要素，充分激发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做到既面向国家需要，也面向学术的发展和未来人才的培养，拓展加深各学科的研究能力和潜力，构筑跨学科、全方位、多层次、有活力、协同合作、共同攻关的学科新布局。

区域与国别研究是将各国、各地区的地理、文化、经济、政治、社会、民俗、组织、制度及人类其它各种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是对包括本国在内的世界人文、社会知识及经济、科学技术发展所做的综合性研究，它的目标是构造全方位的知识体系，为世界整体与本国人民服务。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坚持基础研究的思想导向，以学术为主导，面向世界重点国家、重点地区和重大问题开展基础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形成中国特色、北大优势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范式，为我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及国际学术交流与发展贡献力量。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工作范围包括：1) 学术研究，组织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志在专门、深入、有创造意义的学术成果，向社会贡献学术思想；2) 人才培养，探索新的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以适应区域与国别研究的需要，培养新型人才，使其既具备思考能力，也胜任实际工作；3) 智库功能，在研究与教学的支撑体系保障下就重大问题提供建言，为应对各种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献言献策；4) 扩大国内外学术交流，延展学术网络与思想网络，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成果，传递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努力与国内与国外相关学术机构合作，取其所长，学其所能，并诚请同行的帮助与支持。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博雅工作坊”第八工作间围绕“巴基斯坦——犍陀罗佛教文化与中国新疆的佛寺”主题，结合文献、图像、考古资料，对犍陀罗佛教艺术及其与中国新疆佛寺之间的联系展开深入探讨。

工作坊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主持。巴基斯坦驻华公使穆姆达兹·扎拉·布洛奇（Mumtaz Zahra Baloch）女士和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分别致辞。

布洛奇女士首先对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她简单地回顾了犍陀罗文明的轨迹和巴中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并指出，巴基斯坦目前还留存有许多佛教遗址，如塔克西拉古城遗址和塔赫特巴希（Takht-i-Bahi），它们对于今天我们了解佛教及其历史有着重要意义。另一个重要的地方是斯瓦特，法显、玄奘等人的记载显示当地曾为佛教重镇。布洛奇女士表示，期待北京大学与白沙瓦大学能够开展合作研究，对佛教遗址进行考察，从而进一步研究两国在历史上曾有过的联系，其中，接壤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和新疆两地的联系尤其值得关注。她表示，接下来北大将举办巴基斯坦佛教遗址照片展，希望北大师生和校外人士能够多多关注。另外，巴方还将就遗址和中国学者考察的情况出版书籍，也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钱乘旦院长在致辞中首先感谢了布洛奇女士出席会议，表示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将加强与巴基斯坦相关学术机构的联系。钱院长表示，博雅工作坊作为学术交流和研讨的平台，其目标是使中国能够深入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情况，不但了



### 研究院简介

解世界各国当下发生的事，而且能够了解各地文化的深层内涵。为了完成了解、研究、消化、传播这些知识的任务，研究院需要培养新型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他们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与国家的了解不能仅限于国际关系层面，还应涉及文化、社会层面。举办工作坊，就是希望通过比较研究，达到对上述知识深层了解的目的。

第一场会议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教授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嘉妹副教授。她的发言以《古今往来路，文明交汇地——白沙瓦》为题，结合自己在巴基斯坦的见闻，梳理了犍陀罗地区重要城市白沙瓦的历史与当下。

据张嘉妹介绍，白沙瓦处在中国通往南亚次大陆的交通要道上，位于开伯尔山口东端，是由此山口进入次大陆的第一座城市。由于地处盆地，水土丰饶，白沙瓦自古以来都是人群的聚集地，物产丰富，多能工巧匠，在各个时期均扮演着国际市场中转站的角色。同时，白沙瓦也是巴基斯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的省会，是连接开伯尔普什图省和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政治要地，使用包括乌尔都语、英语、普什图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经过白沙瓦的大干线 (GT Road) 连接南亚次大陆和中亚地区，被认为是亚洲最古老最长的公路之一，是历史上从西北进入次大陆的必经之路，现在仍保存着 16 世纪莫卧儿王朝时期的面貌。历史上，白沙瓦具有突出的政治地位：迦腻色伽王登基后，迁都白沙瓦，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定其名为白沙瓦，沿用至今。当地有丰富的佛教历史遗迹，比如贵霜王朝时期，迦腻色伽王下令兴建了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大佛塔。

张嘉妹还对白沙瓦的名字做了一番考证，发现有 Purushapura—Parashawar—Peshawar 这样一个发

展过程。梵语 Purushapura，意为“男人之城”，其中 pura 意为居住地。中国典籍中记载的丈夫土、丈夫城、丈夫宫、布路沙布逻城等名称，就是由这个词翻译过来的。至 10 世纪，此地以 Parashawar 之名为人所知。莫卧儿王朝阿克巴大帝时期，赐名 Peshawar，据说取自波斯语“前线城市”之意。宫廷史官阿布勒·法兹尔曾在波斯语史书中同时采用 Parashawar 和 Peshawar 来指代这一地区。而根据巴基斯坦当代历史学家达尼教授的记载，白沙瓦还有其他的曾用名。

张嘉妹表示，因为关于白沙瓦的消息多是负面的，所以自己对白沙瓦总是望而却步。此次考察，她参观了附近的佛教遗址和白沙瓦博物馆，也浏览了街景，感觉这座城市相对保守但同时也挺热闹。

据她介绍，1947 年巴基斯坦建国后，白沙瓦成为西北部地区的文化中心。1950 年白沙瓦大学建立，并逐渐将英殖时期的研究机构并入其中。60 年代美苏冷战期间，白沙瓦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巴的基地。80 年代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白沙瓦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政治中心。

目前，白沙瓦的居民除了人口占多数、来自阿富汗的普什图人外，还有讲 Hindko 语的当地少数族裔，他们自称是“白沙瓦人”，比普什图人更早来到这里。在白沙瓦，虽然穆斯林是绝对多数，但锡克教徒、印度教徒、基督徒也共聚于此，历史上，祆教徒、巴哈伊教徒也都在此地定居生活过。如今当地的文化呈现出犍陀罗文化、Hindko 文化和普什图文化共生共存的现象，这在音乐、绘画、文学等领域，以及节庆、家庭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表现。值得关注的是，白沙瓦是目前巴基斯坦锡克教徒最多的地方，此地曾属于锡克帝国的一部分，英殖民时期锡克教徒迁出，分治以后，大量锡克教徒去了印度，而随着阿富汗难民涌入，又来了大量锡克教徒。巴基斯坦普什图人的历史可以追溯

到 11 世纪，最早定居下来的是 Dilazak 支，15 世纪又有两支普什图人来到了白沙瓦，他们共属一个子部落。

莫卧儿王朝时期，白沙瓦实际上属于边境地区，中央对它的控制力并不强，当地发生了一些起义和反叛运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普什图人在圣贤 Roshan 长老的带领下发起的隶属苏非派的 Roshaniyyas 平等运动。莫卧儿王朝之后，波斯人、阿富汗人、英殖民者和锡克教徒都在此地留下了他们各自的印记和文化影响。

伊斯兰教在 7 世纪后期传入白沙瓦地区，在此之前的公元前 5 世纪，白沙瓦属于古波斯文化圈；前 4 世纪，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使得白沙瓦受到了希腊文化的影响，之后孔雀王朝建立，与塞琉古帝国不断争斗，白沙瓦曾属于孔雀王朝，且为孔雀王朝最西端的城市；前 3 世纪，巴克特里亚在此地建立了政权，在巴克特里亚与安息 的争斗中，此地的文化也受到 影响；公元 1 世纪贵霜王朝建立后，白沙瓦成为冬都，迦腻色伽时期取消了夏都，白沙瓦成为帝国唯一的都城；5 世纪，此地又被匈奴人所占领。

最后，张嘉妹对发言进行总结：在连接印度次大陆和中亚的商道上，白沙瓦始终是南来北往的中心枢纽之一，是丝路南道上的重要驿站，往来的商队让白沙瓦地区的居民“开阔了眼界”。在这里，奇闻怪谈、各派思想和商品货物一起跟随商贾小贩传往各地。纷沓的铁蹄让“族群”的身份感更加强烈，生死面前有宗教慰藉个体，有反抗爆发于群体。在自我保护的强烈需求和“开放”的市场中，形成了“保守”的社会面貌。今日之近看，不妨越过表层的“保守”，感受身后的包容与多彩；今日之远观，也勿忘多种文化的交错融合。

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扎希德·安

瓦尔（Zahid Anwar）教授以《“一带一路”、中巴经济走廊和巴基斯坦的文化遗产保护》（BRI, CPEC and Cultural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Pakistan）为题，探讨了“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在丝绸之路背景下对巴基斯坦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影响。

安瓦尔教授指出，古代丝绸之路是洲与洲之间贸易和文化积极联系的象征，是早期通过区域间贸易进行政治和文化融合的表现。南亚是丝绸之路网络的一部分，现在的巴基斯坦在当时是丝绸之路通往南亚的门户。

对于文化遗产的概念，安瓦尔教授指出，黄河和印度河孕育了两大文明，产生了诸多世界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描述了我们的身份以及我们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联系，是所有的人类创造和表达的证据，通过法律和条约保护文化遗产势在必行。对于中巴文化交流以及“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对巴基斯坦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影响，安瓦尔教授认为，在古代，中国和南亚之间的互动使双方都受益。中国人的游记中有大量关于南亚历史的信息，是当时关于南亚社会的丰富和可靠的信息来源。巴基斯坦通过丝绸之路与中国有着数千年的文化联系，连接两个地区，促进了贸易和文化互动。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复兴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古老的文化联系，在这个“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中巴两国都将对巴基斯坦各个地区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予以关注。在这方面，双方已经做出了许多努力。例如，中国陕西省政府和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什图省政府签署了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下的谅解备忘录，以保护联系两国的文化遗产；今年四月，参与本次工作坊的一些中国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在巴基斯坦考察了佛教遗址，并访问了白沙瓦大学。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在努力保护中巴经济走廊沿线的、已经通过考察确定的考古遗址，对这些古迹的保护和开发将使所有人受益。中巴经济走廊不仅涉及道路、铁路和管道，还涉及这些方面的建设对沿线地区

生活质量的影响。最近，中巴签署了协议，将在文化领域进行合作，互相学习对方的文化和遗产，这一协议将增加两国间人员的交流。在“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框架下，人们的联系将增强，文化理解将会得到促进。

安瓦尔教授还提到了暴力冲突对文化遗产的威胁。长久以来，暴力冲突给文化遗产造成了许多损失。例如，1990年至2001年阿富汗内战期间，阿富汗70%以上的文化遗产、文物被毁坏或被走私到其他国家。1998年和2001年，安瓦尔教授访问了阿富汗的多个城市，目睹了战争对考古遗址、稀有手稿和穆斯林陵墓的破坏，以及黑社会对文物的掠夺。

当前，巴基斯坦正面临很好的机遇。巴基斯坦参与建设“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标志着印度河流域将重新成为地区性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键地区。对巴基斯坦而言，“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保护文化遗产。今年二月，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姚敬在访问白沙瓦期间，赴白沙瓦大学为中国研究中心揭幕。中心成立以来，已就中巴经济走廊举行了多次会议。

最后，安瓦尔教授表示，巴基斯坦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区域性的暴力冲突给文化遗产造成了许多损失；城市扩张也使考古遗址面临危险；缺乏保存和修复技术也是急需关注的问题。中国已经开发出保护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可以帮助巴基斯坦建立博物馆、更新历史遗迹和考古遗址的设施。文化旅游也将有助于保护区域文化遗产，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做出集体努力。这都将是巴基斯坦考古遗址保护的一次重大飞跃。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教授发言的题目是《犍陀罗地区与塔里木盆地周缘佛教寺院形制布局的比较研究》。

李肖教授首先指出所要讨论的区域跨越了中亚和南亚北部，大致涵盖了帕米尔山脉的所有区域和今天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新疆的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他根据法显和宋云的行程，指出从四世纪到六世纪佛教文化在上述地区的分布，并认为，虽然法显和宋云的路线并不一致，但从中也能看出当时佛教兴盛的程度和贸易路线的变化。

李肖教授表示，希望通过对犍陀罗、中亚、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佛教寺院建筑形制布局的比较研究，明晰佛教传播的路径和时代，确定佛教寺院建筑的哪些形制布局元素是保持不变或极少变化的，哪些是入乡随俗加入了本地的建筑文化元素，由此推进佛教建筑艺术的研究。同时他指出，由于此次犍陀罗之行考察参观的范围有限，因此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达摩拉吉卡（Dharmarajika Stupa）塔寺、焦里安（Jaulian Stupa and Monastery）佛寺和塔赫特巴希（Takht-i-Bahi）寺院遗址作为中亚和新疆地区的代表进行比较研究。

据介绍，犍陀罗地区佛寺的基本组合由供奉率堵坡的塔院及供僧众们修行的僧院两部分组成，这一点与新疆地区有较大区别。有观点认为这是犍陀罗佛教建筑最重要的创新，且这种模式从犍陀罗地区向西扩展到阿富汗和中亚地区，最后进入塔里木盆地直至中原和东亚地区。贵霜之前的覆钵型佛塔塔身较低矮，呈覆丘状，为印度中部率堵坡的传统样式，周边尚可见到栏楯的遗迹。

达摩拉吉卡塔寺包含有覆钵型率堵波和僧院建筑，其覆钵型大塔亦称“法王塔”，由其覆丘状塔体推测，大约始建于公元前2世纪，与后来的柱状型塔体不一样，说明其时代很早。公元4世纪又进行扩建。佛塔周匝环形礼拜道周边尚存始建时期的栏楯柱遗迹。该塔应是犍陀罗地区最早的大塔，根据塔的形制推测，可能和阿育王传塔有关，该塔废弃于公元6世纪。在此次考察中发现了石栏楯的痕迹，以及方牙和踏步。

达摩拉吉卡塔寺北侧佛寺，由塔院和僧院构成。从形制上看始建于贵霜时期，时代晚于法王塔。整个建筑保存最为完整，由以方形基座的佛塔为中心，众多房间围绕的塔院区和北侧僧院区组成。僧院平面基本呈方形，仅南院墙正中开有院门，这种“大院小门”的形制在西域很常见。李肖教授认为这可能是由于佛教僧团的纪律严密，平常不允许僧众随意出入，因此只开小门。北、东、西三面院墙内均有大小基本一致的僧房，僧院中间为非常宽敞的中庭，中庭之中为一个方形的水池，应是当年僧众们沐浴之处。这种在中庭周围建居室的僧房布局起源于贵霜时期的犍陀罗地区，后来对西域地区有很大影响。

焦里安佛寺由一个僧院和一座大型塔院构成。塔院位于僧院东侧，内部由两个高度不同的平台分成南北高低两院，北侧低院西边尚有一个较小的方院与之衔接。主塔位于南侧高院中央，周边和踏道两侧及前部密布还愿小塔、像龕等，塔院周围建置高大佛龕。西侧僧院为两层建筑，设置庭院、中央水池、排水暗渠、室内灯龕（交河故城许多房屋上也有形制相同的灯龕）、佛龕、经行石路及楼梯，说戒堂、食堂、厨、仓、厕等设施完善，说明其形制已与后来的寺院非常接近。

塔赫特巴希遗址位于古代犍陀罗的中心。遗址中的寺院遗迹主要包括佛塔、僧院、中庭、说戒堂或讲堂以及其他附属设施如院、仓、库、廊等，堪称犍陀罗寺院的典范，其中塔院和僧院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建筑理念与中原和新疆地区完全不一样，只有一小门出入。寺院由中庭、僧院和塔院组成，李肖教授推测中庭残留的放佛像的石龕可能与大像窟有关，中庭两侧凌乱的小塔应该都是还愿塔，塔院中心为塔基，有踏步和方牙。该遗址是犍陀罗地区唯一残存有上层建筑遗迹的寺院，佛龕顶部有残存的佛塔遗迹，内部为方形，顶部为拱形，有托臂结构，僧院与厨房、食堂、布萨处等相连。

关于中亚地区佛教寺院的情况，李肖教授首先介绍了佛教在当地的传播情况和佛教遗迹的分布情况，并选取乌兹别克斯坦的铁尔梅兹地区，塔吉克斯坦赫瓦什河谷，土库曼斯坦的梅尔夫地区（木鹿）的佛教寺院作为主要讨论对象。

铁尔梅兹地区的卡拉切佩寺院因其一半在地面，一半在地下也被称为石窟。它位于铁尔梅兹始建于贵霜时期的旧城内西北角，主要遗迹分布于三个小山丘上，发掘有十几处洞穴。李肖教授以1号洞穴寺院为例，说明其寺院的形制特征。阿吉纳切佩佛寺遗址位于塔吉克斯坦赫瓦什河谷地区，是中亚佛教晚期阶段的佛教遗迹，年代约在七世纪下半叶至八世纪初，该寺院由南侧僧院和北侧塔院组成。塔院中心为方形塔基，四面有踏步，塔基分层有多重叠涩，上面为圆形的塔，这种形制与和田地区的热瓦克佛寺非常接近。塔院的礼拜对象除了佛塔外，还有廊房中的大卧佛像。

最后，李肖教授介绍了中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地区的佛教遗迹。总体上看，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缘的佛教寺院建筑形制在传入之初虽然深受中亚和犍陀罗地区的影响，但加上本地文化的因素，使得其形制与上述两个地区有很大不同，并且由于雪域高原的阻隔，使得犍陀罗与新疆地区历史时期的文化交流并不畅通。特别是塔里木盆地北缘的佛教，不仅传入的时间要晚于犍陀罗和河中地区好几百年，而且传入的路径从现存佛教建筑遗迹考虑，似乎直接受犍陀罗的影响要弱一些，更多的是受中亚河中地区佛教建筑艺术的熏陶。同时，以莫尔佛寺、苏巴什佛寺和热瓦克佛寺的佛塔为例与犍陀罗和中亚地区的佛塔进行比较，说明佛教建筑传入塔里木盆地后加入了很多当地的元素，比如出现了塔基增高、覆斗型佛塔、城堡型佛塔、踏步减少等新的特征。

三位学者发言结束后，首场讨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教授主持。

钱乘旦：请问安瓦尔教授，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巴基斯坦政府的政策是怎样的？对于不同的宗教，政策、法律有怎样的态度？

安瓦尔：政府的政策是一种文化适应的政策。现今，宗教的少数派受巴基斯坦宪法的保护。佛教的文化遗产令巴基斯坦人感到自豪，受到重视和保护。

钱乘旦：佛教在犍陀罗地区和中国新疆都已不再是主流宗教和文化，当地的人们会如何看待这些佛教文化和遗迹？认同就保护，不认同就摧毁？

安瓦尔：目前在巴基斯坦佛教已经基本消亡了，与主流文化相差甚远，主要涉及的是历史、考古等知识层面。政府和人民想要保护佛教的文化遗产，因为它们非常重要。一方面，它们是这一地区历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佛教从这里传到中、韩等国，涉及多个维度，这些维度在知识和历史的领域中都很重要。

钱乘旦：您说到的这些是政府层面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普通民众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安瓦尔：您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普通民众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并且贫穷使得他们对这些文化遗产不够重视。这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经济息息相关，现在人们更关注的是经济发展，如果经济得到发展，人们应该就会更加了解和重视这些文化遗产。

张嘉妹：在城市文化比较发达的塔克西拉，当地人认为这些是属于异教徒的东西，而在看起来更保守的白沙瓦地区，人们更认同这些遗址是他们的文化遗产，也对遗址进行了保护工作。

李肖：伴随新疆的伊斯兰化，新疆的语言等都随着宗教的变迁突厥化了。在文化上可以看出对佛教的明显排斥，但是佛教的某些文化也被当地的文化继承下来（如万字符、法轮等），当地底层民众认为是异教徒的东西，上层人认为这也属于自身的文化。

王邦维：这些地区在历史上都曾是多文化、多宗教的地区，但后来都伊斯兰化了。部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曾捣毁佛教遗址（如巴米扬大佛），但政府层面实际仍然是保护这些遗址的，这种工作实际上从英殖民时期就开始了。但同时文物的贩卖与走私也是实际存在的，并且由于巴基斯坦部分地区政治的不稳定性、宗教极端主义（如斯瓦特地区）以及博物馆的设施老化等问题，总体保护仍处于粗放状态。

李崇峰：当地政治的不稳定性确实为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阻碍。近期，中巴政府正准备签署一个关于文物保护的协议，一旦达成协议，中国将会对巴基斯坦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帮助。

安瓦尔：走私情况是存在的。走私犯会把文物运到他国，斯瓦特地区尤为典型。这是违法行为，走私犯被捕后会被送上法庭，接受审判，但是走私就像一种商业行为，黑社会以低价向当地人购买这些文物，然后转卖。



第二场会议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教授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龟兹研究院研究员苗利辉，题目是《犍陀罗地区石窟与龟兹石窟形制与洞窟比较研究》。

苗利辉研究员首先提出广义上的犍陀罗地区的地理范围，包括阿富汗地区，他从古代犍陀罗与龟兹地区之间佛教艺术的传播路线与僧侣的往来情况两个方面说明二者密切的历史联系与背景。

根据日本学者水野清一在犍陀罗地区的发掘调查报告，苗利辉研究员归纳总结了犍陀罗地区石窟的主要形制与组合特点。他将犍陀罗地区主要的石窟类型归纳为：大像窟、中心柱窟、方形窟、僧房窟以及其它类型的石窟。

一、大像窟：其中最有名的是巴米扬石窟，其不单纯是大像窟，有些石窟在侧后壁还开有方形窟。

二、中心柱窟：主室和后室中间有一方形的柱体。以白沙瓦第70窟为例，窟体中间有方形立柱，但没有壁画，也没有龕。他同时指出：这个中心柱与龟兹是否有关，是什么关系，龟兹的中心柱窟与法王塔是否有关联，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这种中心柱窟数量不多，但在白沙瓦石窟、迦拉贾石窟等主要石窟中都有，并且在石窟的组合布局中处于中心位置。

三、方形窟：形状多样，有方形、圆形、八角形。在洞窟的构成上有单室、双室；顶部比较复杂，有穹隆顶、套斗顶、券顶、尖锥顶；侧壁有开龕的，也有不开龕的；地面有绘壁画的，也有不绘壁画的。

四、僧房窟：该地区数量最多的石窟，有单室的、双室的、多室的，往往配有生活设施，如水井、灯龕等。

关于洞窟组合，除巴米扬石窟外，基本都是单个中心柱窟和多个僧房窟的组合，周围可能还分布有其他石窟，附近常有佛塔。巴米扬石窟以大像窟和方形窟组合为主，此外就是方形窟和僧房窟的组合。比较特殊的是克什米尔地区的斯玛斯特石窟，该石窟是个巨大的天然洞窟，内部建有方形、八角形的小室，覆斗顶和平顶，还有水窖和台阶等。

苗利辉研究员对龟兹地区石窟的主要形制和组合特点进行了总结，并对石窟组合提出一些个人观点。

一、中心柱窟：龟兹地区最具特色、最为典型的石窟，其最大特点是主、后室之间有一方形立柱，方柱上一般有龕，是整个窟室礼拜的中心，窟内绘有壁画，其平面有方形的、长方形的；中心柱有扁的、方的、长方的；顶部多样，随时代变化。

二、大像窟：与中心柱窟非常类似，主要特点是主室正壁前有一高大立像，其在龟兹地区的开凿时间较长，形制变化较大，最主要的变化是主室像柱日益缩小，并逐渐消失。

三、方形窟：龟兹地区数量最多的石窟，它的平面和窟顶形式多样，功用也较复杂，有礼拜的、讲经的、禅修的。

四、僧房窟：主要用于生活，可能也有用于禅修的，由侧甬道和主室组成，一般有生活设施，如门、窗、壁炉等。

五、禅窟：有一条很长的共用通道，多个主室、侧壁，还有很多小室。

六、龕窟：分布很散，不适宜坐禅，可能用于放像。

七、瘞(yì)窟：可能用于存放高僧舍利，存放数量有一个的，有两个的。



关于洞窟组合：类型更为多样，有方形窟与僧房窟的组合、大像窟与方形窟的组合、中心柱窟与方形窟和僧房窟的组合、中心柱窟与僧房窟的组合等，组合形式虽有差异，但都是为了实现息止、禅修的功能。从大的寺院布局来看，大型石窟群往往是以大像窟为中心的礼拜区占据寺院最醒目的位置，不一定是露天的佛塔，如克孜尔、库木土拉石窟。小型石窟往往依据不同功用采用不同布局方式，比如马扎巴哈石窟，四十余洞窟中只有两个中心柱窟、三个方形窟，其余大量都是禅窟和僧房窟。

最后，苗利辉研究员将犍陀罗地区与龟兹地区的石窟进行了总体比较。

第一，关于大像窟：龟兹地区的大像窟没有前室，由主室和后室组成。主室正壁有一个完整的发展过程，早期有像柱和佛像，后期主、后室之间已经没有中心柱，而由立佛的腿部分割出主、后室，这与巴米扬石窟非常相像。此外，龟兹地区大像窟数量众多，基本上在主要石窟群里都有，而且一般都占据石窟群最好的位置，可以说开凿大像窟是龟兹石窟艺术的一个特点。从年代上看，龟兹地区最早的大像窟开凿于公元4世纪，延续到5、6世纪，而巴米扬最早的两个大佛像年代均为公元5、6世纪。由此，龟兹地区影响巴米扬的可能性更大。

第二，关于中心柱：巴米扬石窟的中心柱没有壁画，也没有龕，是否用作礼拜值得怀疑。由此，龟兹的中心柱窟是自创还是影响的结果，值得进一步深思。

第三，关于方形窟：穹窿顶在巴米扬、克孜尔都很多，年代基本都在5、6世纪，而且在龟兹地区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穹窿顶是在原有的正券顶基础上改造而成，外来痕迹明显。但是，一般认为穹窿顶是源于萨珊波斯时期，巴米扬影响龟兹的可能性更大。此外，方形套斗顶与套斗式在巴米扬也更为流行。

第四，关于洞窟组合：龟兹和犍陀罗石窟的功能相对单一，寺院的整体功能是通过不同洞窟的组合来实现的。不同的是，犍陀罗地区具有僧房性质的正券顶长条方形窟数量众多，礼拜窟数量相对较少；龟兹地区具有礼拜意义的中心柱窟、方形窟所占比例很高；中心柱和僧房窟组合在两地很常见，但龟兹地区很少发现佛塔；大像窟、方形窟和僧房窟的组合也是两地的共同点。苗利辉研究员强调，发言主要是提出一些对两地关系的看法和问题，具体到二者在时段上谁影响谁还需进一步研究。

吐鲁番研究院考古所研究员王龙发言的题目是《吐峪沟石窟考古新发现》。吐峪沟石窟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东部，鄯善县吐峪沟乡境内，火焰山中段吐峪沟峡谷内东西两侧的山腰上，洞窟沿吐峪沟峡谷东西两侧分布，分为沟东区石窟群、沟西区石窟群。

吐峪沟石窟现存的洞窟按功能可分为：礼拜窟（包括中心柱窟、佛殿窟）、僧房窟、禅窟和其他生活用窟；按形制可分为中心柱窟、方形窟和长方形券顶窟。石窟的建造方式有其特殊性，大致分为三种：凿崖成洞，在崖壁前径用土坯垒砌，凿崖与土坯垒砌相结合。其中，第三种建造方式又有数种不同手法，这也是高昌时期石窟的一个重要特点。吐峪沟石窟除洞窟和窟前遗迹外，在峡谷两侧山坡上还分布有许多地面佛寺遗址以及部分佛塔。

吐峪沟石窟是吐鲁番地区开凿时代最早、建筑规模最大、洞窟类型最为齐全的石窟群。石窟群组的年代自5世纪初的高昌郡时期持续至高昌回鹘时期，伊斯兰教传入后，逐渐遭到损毁，直至废弃。

对于近几年石窟考古发掘的整体情况，王龙介绍说，2010—2011年主要发掘区域是沟东区，共清理了洞窟56处，主要洞窟类型包括：塔庙窟、佛殿窟、禅窟、僧房窟，以及其他储藏性洞窟等。

塔庙窟：K18 窟中间为中心塔殿，四面则依山体用土坯垒砌成墙，窟内地面用方砖铺地。洞窟大致坐东朝西，具前廊、主室，主室平面呈纵长方形，中心柱略靠后部，窟门前有台阶痕迹。中心柱窟残存大型的背光及莲座，从背光残存的情况看，估计原塑立像高应在 4 米以上。该窟左、右、后三甬道内通壁绘壁画，在南甬道外，新发现一额绘有山羊胡须的菩萨，这是前所未见的。NK2 窟也是一座塔庙窟，左、右、后三甬道内部绘有壁画，保存较为完好，甬道西端转角处绘有两身形像奇特的护法类神像，属于此前未见的人物形象。

僧房窟：发现多种类型，如成排式的僧房窟；两洞组合仅有一个入口；多个洞窟连合等。

禅窟：以一个纵向洞窟为主，左、右、后开小龛。

储藏性洞窟：数量不多，后室有窖藏坑。

沟东、沟西区出土了大量的遗物，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书。文书以佛教写经为大宗，还有世俗文书和古书注本等。文书以汉文为主，也有其他古代西域流行的文字语言，如粟特文、梵文、回鹘文、藏文等等。部分文书保存较为完整，并有纪年题记，字体风格最早为公元 4、5 世纪，最晚约在高昌回鹘时期。此外，还有绢画、纸画、纺织品及其他文物。

2013—2015 年主要发掘区域是沟西区，采用从北向南、从里向外、从上向下发掘的方式，共发掘洞窟 17 座（塔庙窟 3 座；僧房窟 9 座；4 座禅窟；佛坛 1 座），佛塔 2 座，地面佛教寺院 1 座。

塔庙窟：K12（K31）窟由主室、前室和阶梯构成，推测原有佛像应为坐像。K3 窟门前有残存覆钵塔的痕迹，窟内有像座，发现有佛像残块、壁画和题记等。僧房窟：K27 窟内部保存有壁画，此次发掘发现了 K27 窟的门，后

室发现一陶缸，尚不清楚内部残留物的成分。禅窟：K10 窟前室、后室左右各开 3 个小龛，窟内有壁画残存，发现许多精美回鹘文、婆罗谜文、汉文等文字题记，仍有待进一步解读。此外，吐峪沟洞窟存在很多洞窟打破、洞窟重建、壁画重绘的现象。

2016 年度主要对沟西区中部高台上尚未清理的洞窟进行发掘。在沟西区崖下发现了佛坛窟 WK1；沟口区 2 组中心柱窟。2017 年度主要对沟东区崖下堆积进行了进一步清理，新发现塔庙窟 1 座、佛殿窟 1 座及窟前平台，在沟口区发现僧房窟 1 座。发掘过程中出土了大量纸质文书，多为汉文、回鹘文佛经写本。

其中，在沟西区崖下发现的回鹘时期的佛堂分为前后室，均土坯垒砌。后室四壁及门道两侧壁均满绘壁画，上半部分壁画剥蚀严重，但下半部分保存状况较好。后室正壁原绘有坐佛，现残存束腰须弥座。佛座左侧有衣着华丽的回鹘上层贵族男女供养人像。此外，K58 为塔庙窟，朝向正南正北，分为两期，四壁开龛，有后期补修的痕迹，出土数量可观的纸质文书，大部分为佛教经典，目前已辨识出一部分内容，还需进一步研究。

结合多年的考古发掘，王龙研究员对吐峪沟石窟进行总结：新资料的发现表明，吐峪沟早期石窟在洞窟形制、绘画手法等方面与龟兹石窟、甘肃早期石窟有密切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塑画题材方面受来自于西域佛教中心之一的于阗的影响。吐峪沟石窟的营建可以说是有一定规划的，石窟的修建存在自里向外（由北向南）、自上而下依次修建的迹象。从相对年代上来看也是沟内的较早，沟口的较晚，很多洞窟都存在有重修改建的迹象。吐峪沟石窟除了洞窟之外，还清理出许多重要的窟前遗迹、出土了大量的多种语言文字的文书，这些新的发现具有重大学术意义，为研究丝路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张小刚发言的题目是《敦煌壁画中两种于阗历史传说故事画新考》。

张小刚首先从地理和历史两方面介绍了唐宋时期敦煌与于阗的联系。他表示，在五代、宋初，敦煌壁画中出现大量有关于于阗的造像、供养人图像和历史传说画。晚唐时期，敦煌出现成群佛教感通画，在莫高窟最早的佛教感通画图像群中就有许多关于于阗的瑞像，如牛头山等。

第一，关于于阗国王先祖由来的故事。张小刚首先指出这一故事出现在莫高窟 454 窟，并讲述了该窟的概况和形制，以及故事所涉及的甬道内编号 70—76 的画面。张小刚认为，孙修身先生将这组画面比定为毗卢遮那罗汉请于阗王修建佛寺的故事，将画面中的两座城比定为于阗国的都城，并未经过仔细考证，也没有撰写专门文章。也有人曾经根据“胜光夫人”、“夜叉王世界”等榜题，认为这一组图像与于阗没有关系，因为胜光夫人故事的出现与佛教感通故事画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此榜题的出现一直找不到合理解释。

张小刚指出，应将这组画面的内容与藏文史料《于阗国授记》中“地乳”的故事进行比定。他认为这一画面表现的正是阿育王王妃在欢喜苑水池中沐浴之时，看见毗沙门及其眷属从上方凌空而过的场景。画面中骑着狮子的正是夜叉王毗沙门天，下方的城市可能是于阗都城，城中的水池表示王妃正在沐浴。他表示，如果这一比定成立，那么整组画面表现的就是于阗国王先祖由来的传说。这幅画面画在牛头山底下，牛头山底下又有表现阿育王以手遮日的故事，可能正是用这个故事引出《于阗国授记》中阿育王建 84000 塔和阿育王到于阗宿营的故事。他指出这组画面在整个敦煌石窟内属于孤例，而 454 窟大概修建于公元 974 到 976 年间，这组画面在现存的敦煌感通故事画中属于比较晚的图像，在别的石窟内也没有见到。由此，他提出几种可能的原因：第一，它传到敦煌或者是被选择作为洞窟绘画题材的年代比较晚；第二，454 窟是一个比较大

的石窟，它可以使用的平面也更大，可以容纳更多的佛教感通画题材；第三，454 窟修建之时，是敦煌和于阗关系非常密切的时候，窟内绘有于阗国王及曹皇后的供养像，在这种背景下，绘出于阗先祖由来的传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窟中国王的身份尚不能确定。同时，张小刚认为：如果依照文献这样比定，那么榜题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榜题中的“胜光夫人”是波斯匿王的夫人——末利夫人，因而佛经中记载的末利夫人的故事与 454 窟中的画面就无法对应，但阿育王的夫人中又没有人被称为“胜光夫人”，这就出现了矛盾。张小刚由此推测：因在佛教中胜光夫人笃信佛教，名气大于阿育王的夫人，所以将阿育王夫人的故事置于胜光夫人的名下。

第二，关于于阗伽蓝与论道沙门传说的图像。这一图像仅见于敦煌 126 窟的牛头山瑞像底部，画面有榜题“于阗国太子出家事”，起初被怀疑与五代、宋代时许多于阗的太子和公主在敦煌居留有关，后来证明不是。孙修身先生认为，这可能是表现一个于阗国王前世时，在迦湿弥罗出家为沙弥的画面，但榜题和所比定的故事不能完全对应上。

张小刚将这组图像与藏文史料《于阗国授记》和《于阗教法史》中“论道沙门”的故事进行比定。“于阗国王在前往瞿摩帝寺做供养之时，丢失一孩童，后来在牛头山一小山谷中找到，于是在那里修建伽蓝，该孩童后来出家，成为于阗最早证得阿罗汉果的僧人，因此得名‘论道沙门’”。根据敦煌文书得知，凡是于阗王的儿孙都称作太子，因此这个沙门是国王的孩子，当然就是于阗太子，这幅图像讲述的正是这个故事。画面中的城市安放在牛头山下的山沟中也与文献记载相符合，图像中有一大水池，池中有莲花，也体现了《于阗国授记》和《于阗教法史》中于阗为大海之时，海中涌现莲花，后来就在莲花出现处修建伽蓝的传说。

张小刚最后总结指出，454 窟甬道的组画表现的应当是于阗先祖由来的故事，那两座城也是于阗的城；126 窟

甬道的组画表现的应当是《于阗国授记》中于阗国王的王子出家，成为论道沙门的故事。

发言结束后，第二场讨论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肖教授主持。

段晴教授首先针对吐峪沟出土的部分胡语文书的解读成果进行了介绍，并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粟特文的《金刚顶经》，其与唐代不空的译本最为接近，这也可以看出中原佛教对吐峪沟地区的影响。她指出，粟特文文书曾在敦煌和吐鲁番出土过，但是建国以来，还没有出土过粟特文佛经，因此吐峪沟的发现具有重大意义。

李肖教授针对王龙研究员的报告指出，上世纪50年代吐鲁番发掘的考古报告，到现在仍然没有整理出版，希望吐鲁番研究院、中国社科院等要承担起自身的责任，本着为事业、为国家负责的精神，尽快将胡语文书交给段晴教授等专业学者进行整理。

衣丽都教授针对苗利辉研究员的报告指出，从发掘和使用前人资料的角度，可以进一步关注京都大学后续出版的相关报告。同时，她针对佛教石窟的分类问题，提出要吸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她推荐《黑暗中的艺术》（Art in the Dark: the ritual context of Buddhist caves in western China）一文，认为其对研究佛教艺术和佛教石窟是非常重要的。

云冈石窟研究人员提问：龟兹石窟的穹窿顶一般认为源于萨珊波斯，而云冈大像窟也有穹窿顶，有人认为源于鲜卑的草庐，而且两地的年代也大致接近，二者之间是否有联系？或者说是受东传的影响，还是西传的影响？

苗利辉研究员强调：“龟兹地区穹窿顶源于萨珊波斯”这种说法，他只是引述前人的观点。至于云冈穹窿顶的起源，

目前只是猜想，不能确定是否和游牧民族的帐篷生活有关，还需证据证实。此外，在西域也有突厥等游牧民族的活动，在同一时段也没必要将两者联系起来，认为一定是谁影响了谁。

第三场会议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嘉妹副教授主持。

首先发言的是段晴教授，题目是《蛇包塔的象征——键陀罗多元文化解析》。

段晴教授首先指出，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在表达上的特点是不同的。中华文明是书写文明，文字不仅被用于官方的管理，还被用于文学作品、理论作品，其他文明则未必如此。例如尼雅出土的佉卢文文书，书写文字仅用于官方管理，表现精神层面的内容则会采用其他方式。

段晴教授认为，在学术研究中，需要注意细节，如果忽略细节，就会忽略曾经非常伟大的民族对于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她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新疆山普拉出土的具有希腊风格的毛织挂毯为例指出，挂毯上有典型的希腊武士和人首马身的图像，是否就代表着希腊人到了此处？有关这一考古发现的研究，德国考古学教授王睦（Mayke Wagner）的一篇文章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王睦教授对比山普拉和意大利哈德利昂两处的人首马身图像，确定这一图像来源于希腊，但指出细节有差异：山普拉的图像中人物吹萨克斯管，周边的花也不是希腊的。后来有学者指出，萨克斯管是斯基泰人发明的，花也是斯基泰人的，象征天界，为斯基泰人所独有（在乌克兰斯基泰人墓出土的金护胸上也有这样的花）。除了花还有一圈格里芬扑咬偶蹄兽的图案，按照斯基泰人的理念，人死后就由天界所管辖，不再

属于俗界，格里芬的图像是隔离天界和俗界的象征，所以在斯基泰人的墓中经常出现。花就是天花，只要到了这一层，就进入了天界。和这条希腊风格挂毯出土于同一座墓的绛裙，上面也有格里芬的图像，不过已经几何图案化了。为什么在山普拉的墓葬中会出现格里芬图案？这正是因为他们斯基泰人，死后需要通过格里芬来保护灵魂。王睦教授的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墓葬的主人是希腊斯基泰人。但是段晴教授发现，这些人不是希腊斯基泰人，而恰恰相反，是斯基泰人接纳了希腊的神明。在中国发现很多希腊的痕迹，并不是希腊人到达了这里，而是斯基泰人把希腊文明的元素传到了中国。前述山普拉的墓葬文物的年代，根据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1世纪，而在6世纪的毯子上，也有一圈格里芬的图像，中间则都是神灵。如此布局，是因为早期斯基泰人没有庙宇建筑，就用一圈格里芬表示神坛。

段晴教授表示，虽然斯基泰人一般被认为是居住在黑海北边和东边的人群，而塞种人则是居住在阿姆河、锡尔河流域的人群，但斯基泰人和塞种人实际上是同种人，只是在信仰上有各自的特点，贵霜应该也属于这一族。斯基泰人最大的特点是吸纳了希腊的文明，同时也顽固地保留了自己的信仰，他们实际上是两河流域文明的继承者。

之后，段晴教授分享了她在巴基斯坦考察时的新发现。她注意到，在这一地区，波浪状环绕佛塔图案大量存在，根据当地讲解员的说法，这是“中国龙”，对此她并不认同。她重点关注了一个胡维色迦（Huvishka）时代的舍利盒，盒上有佉卢文铭文显示它被说一切有部的法师所接纳，雕刻图案则还有月亮神和太阳神，表现了贵霜王朝自己的信仰。贵霜王朝虽然保护佛教，但自己本身并不一定是佛教徒。舍利盒上还雕刻有的人物和波浪状图案，西方学者认为波浪状图案是花环，俗界的国王扛着它，太阳神和月亮神都在花环上方，花环起到了隔离天界和俗界的作用，其他的扛花环的人物是丘比特。另有三尊坐禅的佛像也位于花

环上方，意味着他们已经离开人世，居于佛土。段晴教授认可西方学者关于波浪状图案表示隔离天界与俗界的观点，但同时她指出，这个图案并非是花环，而是蛇，观察白沙瓦博物馆1941年购入的一件藏品可知，佛塔上缠绕的波浪状图案是两条蛇，整个图像就是蛇包塔。

对双蛇的身份，段晴教授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她注意到了山东省博物馆藏的两幅胡汉相争画像石，其中一幅出土于山东嘉祥县五老洼，胡人头戴尖帽，风神参与争斗（因为斯基泰人有风神信仰，结合画像表现的主题，可以确定此处的胡人是斯基泰人）。另一幅出土于山东嘉祥宋山，头戴尖帽的斯基泰人被双蛇缠绕，与胡维色迦（Huvishka）时代舍利盒上的图像相似。段晴教授认为，这里的双蛇应是赫尔墨斯。据她研究，赫尔墨斯的起源是两河流域的蛇神，原初的形象就是蛇，被希腊人接纳后有了人形。赫尔墨斯的特征是可以隔离阴阳两界并往返其间，赫尔墨斯双蛇形象在鬻鬻上也出现了，他还可以被表现为圆圈状，表示生死轮回。因为蛇会蜕皮，所以在两河流域人们的信仰中，蛇被认为是永生的，它的生命是周而复始的。而在蛇包塔的图像中，蛇代表的就是赫尔墨斯，起到隔离阴阳两界的作用，被包在里面的那部分是神圣的天界。

最后，段晴教授认为，犍陀罗地区可以见到的波浪状环绕佛塔图案应是蛇身的表现。追踪这一图案的神话背景，可以看到几重文明，首先是希腊的赫尔墨斯神，他兼有两河流域文明的蛇神形象，唯有赫尔墨斯可以来往阴阳两界，采用蛇身作为隔离世俗界与天界是合理的。但是，在斯基泰人、贵霜人的信仰中，人的灵魂属于神灵界，所以蛇身隔离开的是天界和世俗界。

故宫博物院孟嗣徽研究员发言的题目是《犍陀罗雕刻“燃灯佛授记”：文本和图像的产生与传播》，主要内容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犍陀罗佛教艺术与中印度佛教艺术的异同。古代印度真正意义上的佛教美术兴起于公元前2世纪末中印度的巴尔胡特和桑奇大塔，两地用浮雕雕刻出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佛陀的形象不以人形来表现，而以圣树、圣塔、法轮、佛足等象征物暗示。有学者认为，表现“佛陀诞生”、“踰城出家”、“初转法轮”（或“降魔成道”）、“涅槃”的“四相图”成为佛教艺术中反复出现的题材，应该肇始于巴尔胡特的佛传雕刻。同时，在西印度的石窟寺院以及南印度的阿玛拉瓦蒂，公元前1世纪也兴起了佛教艺术。犍陀罗地区美术活动的兴起也应在此前后。根据考察发现，犍陀罗佛教寺院建筑较之中印度已有明显变化，犍陀罗地区的佛教美术中，最为突出的是雕塑，单体的造像常以圆雕表现，浮雕则以佛传居多，壁画则较少发现，它们主要附着在礼拜场所的建筑上。在马尔丹塔赫特巴希佛寺遗址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塔院是供养与礼拜的场所，以大型的佛塔为中心，周围有像龕，大小供养塔；僧院是僧人们居住与修行的场所，建有僧房、莲池、讲堂、集会厅等；佛塔周围的壁龕中供奉着大型的圆雕或高浮雕佛像和菩萨像；佛塔的基坛部分及塔身周围饰有大量的佛传故事的浮雕嵌板，使得整个塔院的氛围宛如一个佛教雕刻的画廊。观察犍陀罗地区的小型还愿塔可见，有些基坛饰有一系列佛传浮雕，浮雕从“燃灯佛授记”开始，将佛陀的一生以二十到四十个连续性的场面详实地表现出来，可以说是犍陀罗佛传浮雕的显著特点。

第二部分是犍陀罗佛传故事浮雕与“燃灯佛授记”。以佛传内容为题材的浮雕雕刻是犍陀罗佛教遗迹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这些佛传故事雕刻中，通常以“燃灯佛授记”作为佛传故事的开篇情节，这是在中印度乃至其他佛教地区十分罕见的內容。在犍陀罗本土和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所遗存的犍陀罗佛传雕刻中，“燃灯佛授记”的数量之多令人惊讶，使得这一题材在佛传中显得格外重要。从逻辑上讲，“燃灯佛授记”既是讲述释迦牟尼历劫修行的本生故事的终结，又是释迦牟尼修行成道的佛传故事的开端，

意义重大。但是，佛传中燃灯佛授记的故事第一主角并非燃灯佛，而是后来应身成为释迦牟尼佛的儒童。有关燃灯佛为释迦牟尼授记的记载，广泛地出现在汉译佛经中，如《修行本起经》《佛本行集经》《过去现在因果经》等。这些汉译佛经中，有多部作品的译者和作者与犍陀罗有着密切关系。围绕着经文而展开的犍陀罗雕刻“燃灯佛授记”恰如其分的表现出了文本所提及的情节：一、城门前，儒童向瞿夷买花，瞿夷手执水瓶和莲花，儒童腰围鹿皮衣，手执钱袋与之交易；二、儒童将青莲花抛向站立在中央的燃灯佛的上方，莲花在佛陀上方停立；三、燃灯佛扬右掌为菩萨授记；四、儒童双手合十作跪踞状并陡然升空；五、儒童落地后稽首佛足为佛布发掩泥。白沙瓦和斯瓦特地区的犍陀罗雕刻“燃灯佛授记”采用了异时同图的构图方式，大都选择了这五个主要情节。与中印度的“佛传”雕刻相比，叙事结构简单明了，与故事情节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物、动物以及自然等背景刻画，均被省略到了极致。

第三部分是“迦毕试样式”和“焰肩佛”。在阿富汗艾娜克和贝格拉姆一带迦毕试故国遗址也出土了一类样式为独立的纪念碑式的“燃灯佛授记”雕刻。这类雕刻的情节比上述白沙瓦地区的浮雕要少，一般只有献花—升空—布发掩泥三个情节。许多燃灯佛的两肩上有火焰，被称为“焰肩佛”或“迦毕试样式”。关于焰肩的来源主要有两种解释：根据《大唐西域记》，迦毕试国有迦腻色迦王降伏神龙的传说，当时国王身上出现火焰，佛教艺术家在描述佛的神圣性的时候，借鉴了人世间的帝王形象；另一种说法认为是受到了琐罗亚斯教影响，佛教借用琐罗亚斯教的一些符号来表现佛陀的神力。在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有焰肩佛，东魏、北齐的佛像也有发出火焰的形象，通常被认为是受犍陀罗艺术的影响。

为什么在犍陀罗地区会出现大量的“燃灯佛授记”图像？根据《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犍陀罗地区的那揭罗曷国都城附近即燃灯佛授记故事发生处，是

买花和布发掩泥之处。据英国考古学家康宁汉考订，那揭罗曷都城为今阿富汗贾拉拉巴德西南约二英里处的柏格兰（Dasht-i-Begram）。在古代，那揭罗曷国的燃灯佛圣迹很多，所以《慈恩传》又称此城为“灯光城”或“燃灯佛城”（Dipavati）。儒童向瞿夷所雇之花为青莲花，根据文献记载以及考察所见，犍陀罗地区从古到今都盛产青莲花。

第四部分是“燃灯佛授记”在中国的传播。孟嗣徽研究员先是介绍了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然后展示了库车、库木吐拉、柏孜克里克、云冈等地的雕刻和壁画以及宋代的绢画等“燃灯佛授记”在中国的图像。之后，她简单介绍了对岩山寺西壁壁画《佛传图》中“燃灯佛授记”的研究。岩山寺的佛传壁画的“燃灯佛授记”表现了瞿夷卖花授记—君臣迎佛—布发掩泥一系列场景。值得注意的是，壁画中的燃灯佛头光和身光有火焰，孟嗣徽研究员认为这与焰肩有关系。她还指出，一些学者认为燃灯佛授记中将青莲花卖与儒童并定情缘的是耶输陀罗，这是错误的，根据她的考证，应当是另一位夫人瞿夷。

孟嗣徽研究员最后总结指出，从犍陀罗到岩山寺，“燃灯佛授记”走过了漫长的路程，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其间的一脉相承。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范晶晶发言的题目是《“大出离”图像的犍陀罗模式》。

据她介绍，“大出离”是佛陀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他离开迦毗罗卫城王宫，前往林间修道，这一情节在一些佛传故事中是特别重要的表现环节。范晶晶展示了两幅地图，指出现在的考古发掘还能够看到阿育王时期和巽伽王朝时期的佛教艺术痕迹。

对于“大出离”图像的大致分布与年代，范晶晶表示，按照年代顺序，分布地点有阿玛拉瓦蒂（约公元前150-

100年）、巴尔胡特（约公元前100年）、桑奇（约公元前50年）、犍陀罗（2-3世纪）等。阿玛拉瓦蒂的佛传故事图像基本都是从太子踰城出家之后开始表现，人们认为踰城出家代表着佛陀修道阶段的开始，所以对此非常重视。构图元素和后世有所不同，以象征性的元素来表示，通过城门、马夫和空马来表现太子踰城出家的场面。在巴尔胡特，也有一些表现“大出离”图像的浮雕，表现元素添加了华盖和拂尘。华盖和拂尘在印度通常被看作是国王地位的象征，在“大出离”图像中也象征了悉达多太子的身份和地位。桑奇大塔的“大出离”图像与巴尔胡特相近。范晶晶指出，在较晚的犍陀罗地区，“大出离”的图像数量繁多，且细节的表现更为丰富，往往是以婚礼—内宫—昏睡—出城的系列组图形式出现的。在犍陀罗地区的“大出离”图像中，对于昏睡这一情节的表现很多，这一情节在太子出家故事中是重要的一环，太子正是因为见到宫女们睡态丑陋，所以生起了弃世之心。此外，出土于塔赫特巴希、贾拉拉巴德、斯瓦特等地的不少浮雕，以及日本的一些私人犍陀罗艺术藏品，对这一情节有着相同的表现模式：太子妃在睡觉，太子准备出城，而宫女们则抱着乐器睡得东倒西歪。在一些浮雕中，昏睡场景之前是深宫娱乐的场景；而另一些浮雕则在深宫娱乐之前还表现了太子婚礼的场景。范晶晶表示，根据富歇（Alfred Foucher）的分析，这些系列组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为上下排列，另一类为左右排列，无论哪一种类型，图像都是前后相续的，并且鼓通常都是表现深宫享乐以及妇女昏睡场景的重要元素。

通过图像的比较研究，范晶晶发现了犍陀罗地区“大出离”图像的另一特点：世俗享乐的场景和离欲出家的场景形成对比，前一刻还是深宫享乐，下一刻即是踰城出家，既表现了世俗生活，又显示了宗教情怀。此外，犍陀罗艺术对于世俗生活的表现与中印、南印等地有所不同。有说法认为，受亚历山大东征的影响，在犍陀罗地区有很多表现酒神主题的艺术作品。乐舞的场景最初代表农业庆丰收的活动，在佛教俗家弟子那里则代表因陀罗的天堂。马歇



尔对世俗场景与宗教场景并置的解释是：原本世俗的内容在佛教艺术发展之后，通过一些手段，被转化成了宗教场景。

范晶晶注意到，夜晚妇女在深宫睡眠的场景在多地被表现。如公元前1世纪左右巴尔胡特的“白象入胎”图像，除了摩耶夫人外，还有两位宫女，一位拿着水瓶和拂尘，一位扶着床榻。一些学者认为，犍陀罗艺术对“大出离”图像的表现受到了中印或南印的影响。范晶晶则认为，到后期，应是中印和南印表现妇女昏睡的场景受到了犍陀罗的影响。一方面，巴尔胡特和桑奇虽然也有一些乐舞元素，但它们被用来表现天界的享乐，而在犍陀罗地区，则被用来表现深宫享乐，存在着差异。另一方面，在“大出离”图像中，宫女昏睡的情节对于太子弃世出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而在中印和南印后来出现的一些图像中，有的与“大出离”情节无关，也刻意表现宫女昏睡时丑态百出的情节，与图像主旨无关。可能是这些地方的艺术受到犍陀罗艺术的影响，但对其图像传统不太了解，以至于在一些不必要的场景中也表现了宫女昏睡的丑态。

第三场讨论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嘉妹副教授主持。

钱乘旦院长向段晴教授提问：您提到的蛇，影响的地域范围很大，从两河流域文明，接着到希腊，再到波斯，然后到中亚。在这些地区，这条蛇都是分隔阴界和阳界的象征吗？

段晴教授：对。

钱乘旦院长：汉画像石上的蛇还挺多的。另外，马王堆出土的帛画，上面也有蛇。这些都是分隔阴界和阳界的象征吗？

段晴教授：我主要想讲的是，斯基泰人用格里芬来隔离阴界和阳界，这是斯基泰人文化的象征，而且一直影响

到了新疆。一些学者认为那里的人是希腊斯基泰人，也即希腊人接受了斯基泰人的文化。但我认为，是斯基泰人接受了希腊的文化，是斯基泰人到了那里，而不是希腊人。至于蛇，我又恰好发现在山东博物馆藏汉画像石上的明显是赫尔墨斯的形象，我把这些相似的形象串起来后，发现蛇实际上起到了类似于格里芬的作用，也是隔离阴界和阳界的。斯基泰的各个部落用来隔离阴阳两界的神是不一样的，贵霜用的是赫尔墨斯，这是我的观点。我提到的蛇，它的象征意义是分隔阴界和阳界，这是因为它代表着赫尔墨斯，赫尔墨斯是唯一能够连接阴阳两界的神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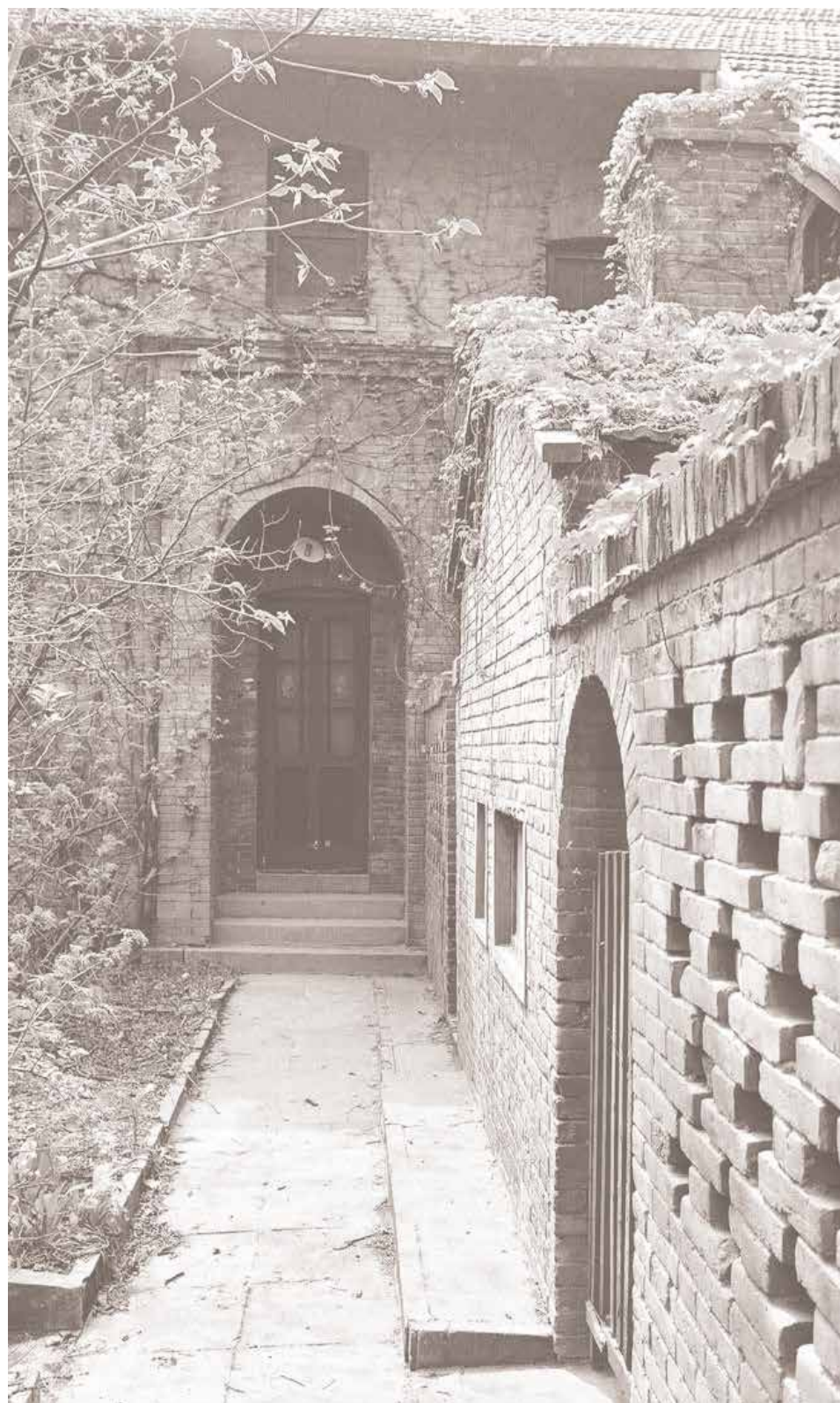
李崇峰教授向段晴教授提问：您认为中国龙、印度龙和西方龙，三者有没有关系？

段晴教授：没有关系。

李崇峰教授：您刚才特别提到有一类浮雕图像叫蛇包塔。在文献中有很多龙王守护的故事，浮雕上的可能不是您所说的蛇。蓝摩塔浮雕上，有龙王守护的图像；克孜尔石窟壁画中，印度的那伽和汉地的龙王也都出现过。您所说的舍利塔上的浮雕，到底是蛇还是龙，是否需要再仔细考虑？

段晴教授：这个问题其实又复杂又简单，涉及到不同文化传统的信仰。中国龙、印度龙在表现上都有它们的特点。赫尔墨斯是双蛇，这是明显的特征，所以我判定这个图像与斯基泰人有关。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斯基泰是不注重文字的文明，文字只限于官方管理，其他的表达都依靠图画，表达天神，他们用的也是图画。犍陀罗是佛传的故乡，我认为这背后就有斯基泰人的影响，斯基泰人为崇拜的对象创造了神话，他们是讲故事的人。另外，应当注意到，佛经故事确实受到过西方的影响，现在可以确定《金光明经》中的故事有希腊渊源，里面提到的龙王、女神来自希腊。

会议尾声，钱乘旦院长首先对参与本次会议的学者表示感谢，他同时表示，对段晴教授报告中提到的蛇特别感兴趣，因为在一个特定的时期，蛇的形象在欧亚大陆的多个文明之中都有所表现，而在这些文明中，蛇是否都被认为是隔离阴界与阳界的存在？他期待看到段教授进一步研究的成果。





整理：郑可心、袁勇

编辑：兰旻

审稿：翟崑

终审：钱乘旦